

郑玄注《孝经》考辨

耿天勤

摘要：郑玄为《孝经》作注，见于多种文献记载和目录书著录，本不值得怀疑，但因此书系郑玄晚年之作，未及传授给弟子，故多数弟子不知，加之其孙郑小同传出时题为“郑氏注”，久之遂有学者质疑。先是南朝萧齐陆澄提出“观其用辞，不与注书相类”，唐修《隋书·经籍志》沿袭其说，刘知几又提出“十二验”以疑之，甚至还有人提出“康城胤孙”说和“郑称”说，遂造成一定混乱。对此，历代学者，特别是清朝学者多予以驳斥，今列举其说并予以考辨。

关键词：郑玄；孝经；孝经注

中图分类号：B222.2

文献标识码：A

文章编号：1009-1017(2010)02-0021-04

东汉经学家郑玄一生遍注群经，但除《毛诗传笺》和《周礼注》、《仪礼注》、《礼记注》因收入《十三经注疏》而流传下来之外，余皆亡佚。有的经注经后世学者辑佚而编订成书，《孝经注》即其中之一。郑玄曾为《孝经》作注，这是应该肯定的，多数学者深信不疑。然对郑玄注《孝经》曾有人表示怀疑，少数学者惑于“郑氏注”而提出它说，并在学术界引起一定混乱，历代学者多有驳正，今仍有考辨之必要。

一、驳陆澄“观其用辞，不与注书相类”

自东汉末郑玄去世之后，经曹魏、两晋至南朝刘宋，郑玄《孝经注》广为流传，且被立为学官，人无异辞。到刘宋范曄撰《后汉书》时，为郑玄列传，列其所注群经，在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之后，列有《孝经》。

然而，到南朝萧齐时，陆澄始怀疑《孝经》非郑注，与王俭书论之云：“世有一《孝经》，题为郑玄注。观其用辞，不与注书相类。”^①就是说，《孝经注》的用词与郑玄注其他经书不同，所以怀疑是郑玄注。加之魏晋南北朝时期《孝经注》所题为“郑氏注”，久之，遂疑“郑氏”是否为郑玄。到唐朝初年修《隋书·经籍志》时，已经不甚明确，

虽相沿亦称“郑氏注”，但又云：“又有郑氏注，相传或云郑玄，其立义与玄所注余书不同，故疑之。”此说显然是沿袭陆澄之说。对于陆澄之说，即“观其用辞，不与注书相类”，清代学者多驳之，今举数例。

陈鱣曰：

自江左中兴，久立博士，穆帝集讲《孝经》云：“以郑玄为主”，荀茂祖《集解》因之，至陆彦渊始疑其不与注书相类，请不藏于秘书，王仲宝违其议，遂得见传。夫郑注《三礼》与笺《诗》互有异同，安在此注之必类于群经乎？^②

按：引文中“陆彦渊”即陆澄，“王仲宝”即王俭。王俭时任尚书令，针对陆澄之疑说：“郑注虚实，前代不疑，意谓可安。”^③仍旧立《孝经》郑氏博士。

侯康曰：

至谓与郑他经注不类，今不尽可考，然康成笺《诗》不同注《礼》，《郑志》诸说每异群经，博雅群儒，固宜有是，亦无可疑也。^④

严可均曰：

郑氏注书百余万言，非旦夕可就，先后不类，非所致疑。即如《五经》注，亦或不类。

《坊记》正义引《郑志》答灵模云：“为记注时就卢君，先师亦然，后乃得毛公传，记古书义又且，然记注已行，不复改之。”《礼器》正义亦引《郑志》云：“后得《毛诗传》，故

①《南齐书》卷39《陆澄传》。

收稿日期：2009-12-21

作者简介：耿天勤（1942-），河北元氏人，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。研究方向：古典文献学。

②《简庄缀文》卷2《集〈孝经〉郑注叙》。

③《南齐书》卷39《陆澄传》。

④《补后汉书艺文志》卷2，《二十五史补编》。

与记得不同。’若然，词不相类，《诗》、《礼》亦有之，何止《孝经》？^①

严可均又曰：

陆澄，善读书者，语非无因，然犹未考。郑所注书，其时有先后，执后定之说以校初定之说，其疑为不相类，宜也。陆疑为不相类者，非谓朝聘、巡狩、郊祀、明堂、丧服，并非五刑也。何以知之？宋、齐注本，五刑未必如《释文》所据本之凌乱，即未必不相类也。不相类者，盖法服耳。……学然后知不足，后说未必皆是，前说未必皆非。郑意如此，顾非陆澄之所能考也。^②

各书内容不同，阅读者对象不同，注书要求也就不可能一样。郑玄笺《诗》与注《三礼》不同，《孝经》是童蒙始学之书，更不可能与注《三礼》一样要求，单从注书用辞不与其注他经相类，就怀疑非一人所注，理由是站不住脚的。

二、驳刘知几所谓“十二验”

自南朝刘宋陆澄提出“用词不与注书相类”说后，至唐朝，刘知几又设“十二验”以疑之，云：据郑君《自序》云：“遭党锢之事，逃难注《礼》；党锢事解，注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论语》；为袁谭所逼，来至元城，乃注《周易》。”都无注《孝经》之文，其验一也。郑玄卒后，其弟子追论师所著述及应对，时人谓之《郑志》。其言郑所注者，惟有《毛诗》、《三礼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，都不言郑注《孝经》，其验二也。又，《郑志目录》记郑之所注，《五经》之外，有《中候》、《书传》、《七政论》、《乾象历》、《六艺论》、《毛诗谱》、《答临硕难礼》、《驳许慎异义》、《发墨守》、《箴膏肓》及《答甄子然》等书，寸纸片札，莫不悉载，若有《孝经》之注，无容匿而不言，其验三也。郑之弟子，分授门徒，各述师言，更相问答，编录其语，谓之《郑记》，惟载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论语》，其言不及《孝经》，其验四也。赵商作《郑先生碑铭》，具称其所注、笺、驳、论，亦不言注《孝经》。《晋中经簿》，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尚书中候》、《尚书大传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，凡九书，皆云“郑氏注，名玄”，至于《孝经》，则称“郑氏解”，无“名玄”二字，其验五也。《春秋纬演孔图》云：“康成注《三礼》、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，其《春秋》、《孝

经》，别有评论。”宋均于《诗谱·序》云：“我先师北海郑司农”，则均是玄传业弟子也，师所著述，无容不知，云“《春秋》、《孝经》，惟有评论”，非玄之所著，于此特明，其验六也。宋均《孝经纬注》引《六艺论》叙《孝经》云“玄又为之注。司农论如是，而均无闻焉。有义无辞，令余昏惑。”举郑之语，而云“吾闻”，其验七也。宋均《春秋纬注》云：“玄为《春秋》、《孝经》略说”，则非注之谓，所言“玄又为之注”者，汎辞耳，非事实。序《春秋》亦云“玄又为之注”也，宁可复责以实注《春秋》乎？其验八也。后汉史书，存于世者，有谢承、薛莹、司马彪、袁山松等，具为《郑玄传》者，载其所注，皆无《孝经》，其验九也。王肃《孝经传》首，有司马宣王之奏，并奉诏令诸儒注述《孝经》，以肃说为长。若先有郑注，亦应言及，而不言郑，其验十也。王肃著书，发扬郑短，凡有小失，皆在《圣证》。若有《孝经》此注亦出郑氏，被肃攻击，最应繁多，而肃无言，其验十一也。魏晋朝贤，辩论时事，郑氏诸注，无不撮引，未有一言引《孝经》之注，其验十二也。^③

刘知几“十二验”之说，影响较大，故全文录之，看其到底能否站得住脚。我们先看刘知几——提出此说的意图，那就是想废除郑注。

考《孝经》原有孔安国注，与郑玄注在梁时并立于国学，而孔注亡于梁乱。陈及周，惟传郑氏。至隋，秘书监王劼于京师访得孔传，送于刘炫，炫因述其议疏，讲于人间。后遂著令，与郑氏并立。学者云炫自作之，非孔氏本。至唐开元年间，诏议孔郑两家，刘知几主张行孔废郑，力陈郑注之伪，故有此议。但刘知几的主张遭到司马贞等诸儒的反对，最终仍行郑学。可见，其说在当时就是站不住的。对刘知几之议，后代诸儒多驳之，今举数例。清代侯康曰：

刘氏“十二验”中，据《郑志》诸书皆不言注《孝经》，则《范史本传》亦不言其注《周官》，唐史承节撰《碑》亦不言其注《论语》。秉笔偶疏，未为典要（说本钱侗），此数事不足疑也。又案：“王肃好发扬郑短，而无言攻击《孝经注》”，然《郊特牲》疏引王肃难郑《孝经注》“社，后土也”之文，是肃未尝无言，此一事不足疑也。王伯厚以“上帝，天之别名”一语，谓与“六天”之说不符。考《礼·大传》注云：“《孝经》曰：郊祀后稷以配天，配灵威仰也；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，配五帝也。”然则，上帝者，五帝之总称，天即

①引自曾朴《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》卷2，《二十五史补编》。

②引自曾朴《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》卷2，《二十五史补编》。

③《唐会要》卷77《贡举下·论经义》。

五帝中之一帝。郊祀之天，非圜丘之天，故云“上帝，天之别名”，与郑生平宗旨不背，此说亦不足疑也。-----宋均《孝经纬注》引郑《六艺论》序《孝经》云“玄又为之注”，此即康成注《孝经》之明证。宋均又云“均无闻焉”者，意注未卒业，不行于世故耶。^①

又，严可均辑本《序》曰：

至谓《自序》所注众书无《孝经》，尤为偏据。刘炫《述义》引郑《六艺论》云：“孔子以《六艺》题目不同，指意殊别，恐道离散，后世莫知根源，故作《孝经》以总会之。”宋均《孝经纬注》引郑《六艺论》叙《孝经》云：“玄又为之注。”此二事并见《孝经正义》，明是《自序》遗漏。郑氏又别为《孝经序》。

《礼记·缁衣》正义、《大唐新语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玉海》各引一事，余既采列本经注篇端，兹故不载。就余所闻，《郑志》及谢承、薛莹、司马彪、袁山松等书载郑氏所注无《孝经》，范《书》有《孝经》，无《周礼》，皆是遗漏。^②正义云“《晋中经簿》称郑氏解”，《经典序录》云“《中经簿》无”，则所据本异也。

又，曾朴曰：

刘知几“十二验”，国朝钱侗、严可均等驳之甚详，惟第十一、第十二二验无驳。按其十一验谓“王肃喜难郑学，而《孝经》无言”。今考《礼记·郊特牲》正义引《圣证论》：“肃难郑曰：‘《春秋》说伐鼓于社责上公，不云责地祇。明社是上公。’又《月令》‘命民社’郑注：‘社，后土也。’《孝经注》：‘社，后土也。’《郑记》云‘社，后土，则句龙也。’是郑自相违异。”按此条即肃难郑《孝经注》，是肃未尝无言也，则知己十一验不足验也。其十二验谓“魏晋朝贤论辩时事，诸注无不撮引，都无《孝经》”。按魏人之有无撮引，典籍散亡，诚不可考。至晋代郑注，据《释文》云：

“江左中兴，《孝经》立郑氏博士。”然《释文》此数语夹注于晋穆帝集讲《孝经》之下，则陆意以《孝经》博士立在穆帝时。考《晋书·礼志》：“太兴初，荀崧上疏云：‘今皇朝中兴，美隆往初。《周易》，王氏；《尚书》，郑氏；《古文》，孔氏；《毛诗》、《周官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郑氏；《春秋左

传》，杜氏、服氏。各置博士一人云云。’”太兴为晋元帝年号，元帝为中兴首帝，至穆帝时，其间尚隔五帝，而已有博士之立，刘知几乃谓“魏晋之朝无有此说，至魏齐始立学官”，误矣。然则博士且立即不必有撮引之证，而刘说自破。况《南齐书·礼志》曰：“晋太始七年，有司奏：‘来年正月十八日祠明堂，复告与否？’祠部郎中徐邈议郑玄曰：‘郊者，祭天名。上帝者，天之别名也。’神无一主，故明堂异处，以避后稷也。”此明是晋人议论时事撮引《孝经》郑注之语，则知己之第十二验亦不足验也。陆澄、刘知几皆先儒之通博者，其所疑难，后人易为所惑，而今细为考核，凡陆、刘两家之所疑者，实无一可疑，则《孝经》之为康成作，固可一言决矣。^③

从以上引文来看，侯康、严可均两位学者针对刘知几所谓“十二验”，或概括驳之，或具体驳之，曾朴则专驳其第十一、十二验。可见，刘知几所谓“十二验”者，实无一可“验”。

此外，清代学者王鸣盛、袁钧、陈鱣、钱侗、姚振宗、胡元仪等皆有考辨，文多不录。

三、驳“康成胤孙”说、“郑称”说

怀疑《孝经》“郑氏注”之“郑氏”非郑玄者，又衍出“康成胤孙”说、“郑称”说。

“康成胤孙”说，始于梁载言《十道志》。唐刘肃惑于《十道志》，在《大唐新语》卷9中认为序郑注者为“康成裔孙”。“康成胤孙”无他，故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、《玉海》谓注《孝经》之郑氏为“郑小同”。对此，虽有信者，然清代学者亦多驳之。今略举数例。

郑珍曰：

按《六艺论》序《孝经》云：“玄又为之注”，则康成注此经自言已明。其《序》云：

“避难南城山，栖迟岩石之下，述夫子之志而注《孝经》。”说者言南城在徐州，则注书之时与地自言亦明。……考康成客徐州在初平三年，时已六十六岁。后四年，为建安元年，自徐州归。归后四年即卒，其孙小同仅四五岁。此注既晚年客中之作，门人当未及传授。洎归后，其稿久淹，衍，亦著书满家者之常，必俟小同长大，检得遗稿，始出而传之。此所以赵商《碑铭》不及具载，宋均注纬亦曰“无闻”，诸门人追述师言，匪惟《郑志》、《郑记》都

①《补后汉书艺文志》卷2按语，《二十五史补编》。

②引自曾朴《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》卷3“郑康成《孝经注》”条，《二十五史补编》。

③《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》卷3“郑康成《孝经注》”条按语，《二十五史补编》。

不言及，即撰著《目录》且无此书，皆以其时注稿未出，并未传习故也。后来稿出，《目录》行世已久，小同自不得增入，谢承、薛莹、司马彪、袁山松诸人撰《康成传》自止据《目录》载之，即《中经簿》以据《目录》无此，故知止从其书题，而不加“名玄”二字，非有他也^①。

此说有根有据，合情合理，令人信服。

严可均《全后汉文编》曰：“《孝经注》，或言郑小同作。今据《唐会要》77引郑玄《六艺论》叙《孝经》云‘玄又为之注’，明非小同作也。”^②严可均又曰：

或又问曰：“近人疑《孝经》郑小同注，何据乎？”答曰：“此说始于《太平寰宇记》，谓‘今《孝经序》盖康城彻孙所作’。盖者，疑词，‘彻孙’必误。近刻改为‘胤孙’，近似矣。小同，汉魏间通人，注本幸存，亦宜宝贵，然而旧无此说。《经典序录》云：‘世所行郑注，相承以为郑玄。引晋穆帝集讲《孝经》云以郑玄为主，陆澄所见宋齐本题郑玄注，《旧唐志》、《新唐志》称郑玄注，未有题郑小同者也。’”^③

问题已明，注《孝经》之“郑氏”决非郑小同，而是郑玄无疑。

至于“郑称”之说，惟见《春秋公羊传·昭公十五年》疏，云“何氏解《孝经》与郑称同，与康成异”，更是不知何据。“称”或是误字，《校勘记》引铺镗云：“郑称当孔传之误。”《校勘记》又引梁玉绳云：“郑偶[称]为魏侍中，有答魏武帝金币之问，见《续后汉书·舆服志》注。又，《魏志》延康元年注引《魏略》言偶[称]笃学大儒，为武德侯骠傅。骠即魏明帝也。”今查《三国志·魏书·文帝纪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，确有“侍中郑称”其人，且为“笃学大儒”，但并未曾言其曾注《孝经》，目录书也未见著录，岂能言其注《孝经》？

四、郑玄注《孝经》无疑

郑玄注《孝经》，除见于《后汉书》本传外，还见于多种文献记载，如：

郑玄曾撰《六艺论》，虽佚，但在宋均《孝经纬论注》有引文，其叙《孝经》云“玄又为之注”，是郑玄自言为《孝经》作注。

唐代史承节在万岁通天初撰《后汉大司农郑公之碑》，具载郑玄经注，其中有《孝经注》。为郑玄

撰写碑文，其言必有根据。

从后世目录书来看，著录《孝经》时明确题为“郑玄注”的。史志目录，如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；官、私所修图书目录，如宋代官修的《崇文总目》和陈振孙的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。题为“郑氏注”者，如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，乃沿袭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。其实，此“郑氏”是后学对郑玄的尊称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多见，并不值得怀疑。

郑玄是何时何因到徐州南城山去注《孝经》的呢？今考郑玄行踪：汉灵帝中平六年（189），郑玄为躲避青州黄巾军而到徐州，直至汉献帝建安元年（196）才回高密，在徐州长达七年。郑玄在徐州的活动，见于记载的，主要是在南城山注《孝经》。其《孝经序》云：“仆避难于南城之山，栖迟岩石之下，念昔先人，余暇述夫子之志而注《孝经》。”

《太平寰宇记·沂州·费县》：“南城山……今西上可二里许，有石室焉，周回五丈，俗云郑康成注《孝经》于此。”《齐乘》卷4：“南城城，费县南百余里，齐檀子所守，汉侯国，属东海，因南成山而名。汉末黄巾之乱，郑康成避难此山，有注经石室。”可见，郑玄晚年在南城山注《孝经》是可以肯定的。至于他为何到徐州南城山，盖因当时郑玄故里青州黄巾军甚盛，而徐州则较为安宁。据史书记载：陶谦“为徐州刺史，击黄巾，破走之。……是时，徐州百姓殷盛，谷米封赡，流民多归之”^④。郑玄《孝经注》是其晚年客中之作，自徐州归高密时年已七十，且生活极不安定。建安二年（197），“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，遣使要玄，大会宾客”；建安三年（198），“公车征为大司农，给安车一乘，所过长吏送迎”；建安五年（200），“时袁绍与曹操相距于官渡，令其子谭遣使逼玄随军。不得已，载病到元城县，疾笃不进”^⑤，六月，病逝于元城。郑玄自徐州回乡后，四年即卒，或未及定稿，亦未向弟子传授，故赵商《碑铭》不具载，宋均注纬曰“无闻”，门人《郑志》、《郑记》皆未言及。及郑小同长大成人，整理其祖父遗注，发现此书，始向社会传布，并尊称“郑氏注”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郑玄弟子及再传弟子众多，皆尊郑玄为“郑氏”，故《隋书》作者相沿署名“郑氏注”，但有的学者已不甚清楚“郑氏”为谁，致使刘知几有“十二验”之论，后世个别学者对文献记载视而不见，专爱猎奇，又衍出作者为“郑小同”、“郑称”之说。

（责任编辑：黄云鹤）

①《郑学录》卷3《书目》。

②姚振宗《后汉艺文志》卷1，《二十五史补编》。

③曾朴《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》卷3引，《二十五史补编》。

④《三国志》卷8《魏书·陶谦传》。

⑤《后汉书》卷35《郑玄列传》。